

楚调秦腔西秦腔 不是陕西山二黄——兼答束文寿先生

苏子裕

《戏曲研究》第 74 辑

—

束文寿先生《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¹⁾发表后，在戏曲史界，引起了一些争议。笔者写有《“京剧声腔源于陕西”质疑》一文⁽²⁾，与束先生商榷。后见束文寿先生在《中国戏剧》2005 年 12 期发表的《二黄腔是早期秦腔的主要声腔——答方月仿先生》一文，其所涉及的一些根本问题，我在《质疑》一文中，多有所论及。但该文又冒出了一些新的重要提法。有些不同想法，要向束文寿先生再进一言。文章写好之后，先后在网上和《戏曲研究》第 70 期（2006. 11）见到束文寿先生《再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原来，束文寿先生的《再论》是在答复方先生先生的文章写好之后，见到我的《质疑》一文，加写了第五部分《江西宜黄腔源头为秦腔》，作为对我《质疑》一文的回应。因此，我也不妨在原先写好的文章基础上，对《再论》提出的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一、陕西二黄真的发源于故都长安吗？

束先生在《二黄腔是早期秦腔的主要声腔》一文第一部分《陕西二黄的源头根本不在湖北》中，匆匆忙忙、草草率率地抛出了一个新说法：

陕西二黄，系秦中古调戏曲声腔，故称秦腔、西曲、秦声等，发源于故都长安，明末清初流传各地。清乾隆初逾越秦岭，流播于陕南汉水流域的汉中、安康和商洛各地。（页 42）

关于陕西二黄戏的起源问题，是研究陕西二黄戏史的基础，也是研究陕西二黄戏与其它皮黄剧种相互关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束先生研究汉调二黄，至少有二十多年，恕我直言，在我所见到的束先生的有关论文中，有关陕西二黄的起源问题，尚未见到一篇较为清晰的文字。我之所以说束文“匆匆忙忙、草草率率”，是因为这是束先生首次非常明确、肯定地公布自己的“陕西二黄发源于故都长安”这一说法，未加任何解释和说明，全然见不到任何“记载和实证”。窃以为这样做不妥。希望束先生就陕西二黄发源于故都长安的问

题，写出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来，以便我们共同讨论陕西二黄戏是否是“产生京剧的真正母体”和皮黄腔的“根本源头”。如果陕西二黄起源的时间、地域都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说法，那就很难论及其它了。

不知何故，此文发表之后不久，束先生 2006 年 4 月 30 在陕西戏曲研究院网页和 2006 年 11 月《戏曲研究》第 70 辑发表的《再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中，却把前引有关陕西二黄发源于故都长安这一非常重要的论断删除了。不知束先生有何新的想法？

束先生《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中论述陕西二黄戏的源流问题时，有自相矛盾的情况。我在《质疑》一文指出：束文一方面说“陕西二黄戏作为陕西最为古老的戏曲声腔”发源于陕南汉水流域。另一方面，该文不仅没有谈二黄戏在陕南形成之后如何由陕南向本省其它地区流布的情况，反而不止一处指出，西安的二黄戏班流入陕南，方有汉调二黄。为此提出质疑：陕西二黄戏的发源地究竟是西安还是陕南？

但束先生《再论》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说：

苏文焊接的这句话（笔者按：即“陕西二黄戏作为陕西最为古老的戏曲声腔”发源于陕南汉水流域），本来就不是笔者的观点。拙文无一处说陕西二黄的声腔基础起源在陕南汉水流域或者形成于汉中、安康。（《戏曲研究》第 70 辑第 124 页）

的确，束先生原文中，没有明写陕西二黄“发源于陕南汉水流域”这句话。这句话是我根据《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概括出来的。束先生在《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中说：

陕西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源远流长的陕南汉水文化底蕴，为秦腔二黄戏的形成发展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宋、元以来，受南戏、北曲、杂剧、昆腔的影响，在古老的西曲基础上，经过陕西多少代艺人的辛勤努力，创造加工，致使其于清代乾隆年间达到较为完美的艺术高度。

文中所谓“得天独厚”，就是说，除了陕南汉水流域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具备陕西二黄戏形成发展的条件了。我根据束文说的“陕西的博

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源远流长的陕南汉水文化底蕴，为秦腔二黄戏的形成发展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论断，以及束文中引述的齐如山先生关于“皮簧产自汉南”的观点，把“陕西二黄发源于陕南汉水流域”当作束文的文观点，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怎么能说是“焊接”呢？束先生在《再论》中解释说：“这句话意义明确，是说陕西二黄在陕南流传发展，要受汉水文化底蕴影响”。这种解释，把原文中的“形成发展”四字，变为“流传发展”，意思当然不一样了。戏曲声腔的发源地与流行地域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原文写的是“流传发展”，我就不可能就此问题发表任何议论。

再则，齐如山的“陕西二黄”说和程砚秋的“两种秦腔”论，是束先生“前后秦腔”论的立论基础。但齐如山、程砚秋两位老前辈都没有说陕西二黄发源于西安。而齐如山先生倒是说过“皮簧产自汉南，是毫无疑问的了”。齐先生关于“皮簧产自汉南”这篇文字，束先生在《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中是引用了的。其对齐先生关于“皮簧产自汉南”的观点，未加任何议论，也是事实。但是，如果束先生不同意齐先生关于“皮簧产自汉南”的观点，应该在引述之后明确表示。而我们看到的是，这段引文之后，束先生紧接着介绍齐如山先生致力戏曲研究的成就，还说：“齐氏考证二黄产地不单靠书本只言片语记载，而更重实际考察的严谨治学观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既然束先生对齐如山考证“二黄产地”的“严谨治学观点”，认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读者只能据此理解为，束先生对齐先生关于“皮簧产自汉南”的观点，至少是不反对的，甚至是深受影响的。

如今束先生要肯定二黄产自西安，是否应该郑重其事地对齐如山先生“皮簧产自汉南”的说法来个否定、修正或解释？是否考虑把“陕西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源远流长的陕南汉水文化底蕴，为秦腔二黄戏的形成发展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论断作废呢？

二、莫把韩江当汉水楚调秦腔是两腔

自《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开始，在束先生笔下，“汉调二黄”便有了许多的新名称，诸如“前秦腔”、“秦腔二黄戏”、“二黄秦腔”、“早期秦腔”等等，不一而足，令人目不暇接，颇费思量。作为戏曲声腔探源，这样写未尝不可，但应拿出相关的证据作来适当的解释，对每个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应有所界定，以免引起歧义。最好能统一起来。《二黄腔是早

期秦腔的主要声腔——答方月仿先生》的第四部分“早期秦腔在湖北的流传与兴盛”，又提出了一种新的声腔名称——“楚调秦腔”。

束先生提出“楚调秦腔”的根据是他在湖北《汉剧志·源流沿革》中见到的一首诗：“乾隆年间，乐钧的《韩江棹歌一百诗》中有‘马锣喧击杂胡琴，楚调秦腔间土音’的记载”。束先生认为：

经过了数十年的流传，秦腔已可由湖北艺人运用当地的方音土语演唱，也就是说，此时的秦腔在湖北已逐步“鄂音”化了。

诗中明确有‘楚调秦腔’的提法，很清楚地说明这就是用湖北方音演唱的秦腔，或者是由湖北籍艺人演出的秦腔。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汉剧志》看出，‘楚调秦腔’是这一时期湖北戏曲的主要声腔剧种。

束文所谓“楚调秦腔”的说法，主要内容是秦腔在湖北“鄂音化”，其根据主要来自“楚调秦腔间土音”这一诗句。其实，诗句中的“土音”，不是“鄂音”，而是“潮州音”。束先生如果查对一下乐钧这首诗的原文⁽³⁾，就不会产生这种误解了。原诗为：

马锣喧击杂胡琴，楚调秦腔间土音。昨夜随郎看影戏，月中遗落风头簪。

原注：潮人演剧鸣金以节丝竹，俗称马锣。夜尚影戏，男妇通宵聚观。

显而易见，此诗所写为广东潮州人演剧的情况，“楚调秦腔间土音”之“土音”，也只能是“潮州音”了。其实，即使不查原诗，只要查一下诗题中的韩江在何处，也就可以知道原诗所记的“楚调秦腔间土音”，是在广东潮州，而不是湖北。至于潮州当时流行的“楚调秦腔”是什么戏曲声腔，尚可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乾隆年间广东潮州的楚调秦腔是两种戏曲声腔，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江西巡抚郝硕查办戏曲的《奏折》⁽⁴⁾记载：

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

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惟九江、广信、饶州、赣州、南安等府，界连江、广、闽、浙，如前项石碑腔、秦腔、楚腔时来时去。……谨奏。

郝硕的《奏折》是给皇帝的报告，是不敢略有差池的。该文将秦腔、楚腔（即楚调）并列，可见当时乾隆间广东盛行的秦腔、楚腔（调）是两种戏曲声腔。显然，束文中所说的“楚调秦腔”“这就是用湖北方音演唱的秦腔，或者是由湖北籍艺人演出的秦腔”，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广东西秦戏是陕西秦腔戏吗？

《二黄腔是早期秦腔的主要声腔》一文第三部分“粤地西秦戏陕西老二黄”提出了“西秦戏即为陕西秦腔戏”这一观点：“明清人积习，简称陕西为西，如西商、西省、西曲、西班等，西秦戏即为陕西秦腔戏，名称标志鲜明，流传来路清楚”。

这段文字有两个问题：

其一，陕西有时可简称为“西”，但西部并不只有陕西省，山西、甘肃诸省亦在西部之列。故此，“西曲”、“西班”（或称“西部”）不仅仅是指陕西的戏曲、曲调、戏班。山西有时亦可简称为“西”。如清乾隆吴太初《燕兰小谱》记载北京太和部的两位演员，一位是张秀莲，山西太原人，“宛如吴下女郎，绝不意其为西人之子”（卷二），则山西人可以称为“西人”；另一位是薛四儿，山西蒲州人，“西旦中之秀颖者”（卷三），则山西的旦角可以简称为“西旦”，山西的戏曲亦可称为“西曲”，如洪升《长生殿·弹词》一折中，净角扮山西客，听唱【转调货郎儿】曲牌，认为是“咱家的西调”。所以不能一见到“西”就认为是指陕西。

其二，“西秦戏来源于古代的西秦腔。”⁽⁵⁾

束文介绍说：

据当地具多年研究经历的学者吕匹所著《海陆丰戏见闻》一书介绍西秦戏，系明末西秦腔（即琴腔、甘肃调）流入海陆丰后，与地方民间艺术结合，至清初逐渐游离于本腔（西秦腔）而自立门户，形成了别具风格与特色的西秦戏剧种。

引文中吕先生说的“西秦腔（即琴腔、甘肃调）”，当是出自清乾隆

吴太初《燕兰小谱》卷五的记载：“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可见吕先生也是认为，西秦腔流入海陆丰后，衍变为当地的西秦戏。这种西秦腔因产生于甘肃，故名为甘肃调。

产生于甘肃的西秦腔与产生于陕西的秦腔，不能混为一谈。西秦腔就是西秦腔，不是秦腔。而束先生却把“西秦戏”这一名称，生吞活剥地解释为“陕西秦腔戏”（即陕西二黄戏）。依此搬演，“西秦腔”岂不是必须解释为“陕西秦腔腔”或“陕西秦腔的腔”？这恐怕是说不过去的。西秦戏就是西秦戏，绝不是束文所谓的“陕西秦腔戏”。

西秦戏传入广东的情况说法不一。束文说：“笔者几次实地考察中，艺人们皆言前辈代代相传，西秦戏来自陕西，‘我们一直尊陕西为祖地’”。果如其言，则广东的西秦戏或许是陕西的西秦腔戏班带来的，但这是西秦腔，而不是束文所说的“早期秦腔”（陕西二黄戏）。

我认为，要证明两种声腔、剧种有渊源关系，必须把两者的声腔构成全面进行对比、解析。《中国戏曲志·广东卷》“西秦戏”条说：西秦戏的“主要声腔有正线、西皮、二簧以及昆曲、小调，正线是西秦戏本腔，其剧目占全部剧目的三分之二以上，西皮、二簧是后来从皮黄剧种吸收过来的”。（页 89）

西秦戏的本腔正线曲分为二番（二凡）、梆子两大类，并不包括西皮。西皮是后来从其它皮黄剧种吸收进来的。假定束先生关于广东西秦戏源于陕西二黄戏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广东西秦戏也只是继承了陕西二黄戏中的二黄腔，而西皮腔则另有来路，与陕西二黄戏无关。但这种情况，却与束先生的“西皮二黄同体”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所谓“西皮二黄同体”的观点，即束先生在《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中论述的“凡流传各地的二黄戏，唱下把‘西皮’的，必有唱上把‘二黄’的，唱‘二黄调’的也必有‘西皮’。”（页 32-33）。如果真如束先生所说“西秦戏即为陕西秦腔戏”（按，此处束先生所说的“陕西秦腔戏”即陕西二黄戏），为何广东西秦戏的西皮不是出自陕西二黄呢？难道当年传入广东的陕西二黄戏仅有二黄而无西皮么？

显而易见，广东西秦戏正线曲的起源应是西秦腔、甘肃调，与陕西二黄戏没有承传关系。西秦戏中的正线曲，与二黄腔比较相似，那是因为二者都发源于西秦腔，而正线曲保留了西秦腔的基本特色，故有“西秦戏”之称。西

秦腔与二黄的确存在渊源关系，但西秦腔是源，二黄腔是流。正线曲的出现早于二黄腔。广东西秦戏不是起源于陕西二黄戏。

四、不能把西秦腔与秦腔混为一谈

把西秦腔与秦腔混为一谈的情况，在《再论》一文第五部分《江西宜黄腔源头为秦腔》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束文列举了当代江西人写的四篇有关宜黄腔的文章，说：“以上包括苏子裕先生著作的记载，无一不是说江西的宜黄腔（二黄腔）来源于明末的秦腔”。（页 129）

束文的这句话，有三个问题：

（一）、“记载”二字，用得甚为不妥，且不管宜黄腔来源于西秦腔还是秦腔，从无文字记载。今人的考证不能作为“记载”。如果能找到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束先生功莫大焉。

（二）四篇文章中都是说宜黄腔来源于西秦腔，而不是秦腔。唯有束文所引述的黄振林先生的文章中，在两处谈到“著名的宜黄腔，还渊源于远在西北千里之遥的西秦腔呢”、“清代宜黄腔最基本的唱腔是‘二凡’，它的原始曲调，即来源于西秦腔”之后，有“宜黄腔的原始曲调，来自秦腔，特别是西秦腔的唢呐伴奏的‘二犯’和以笛子伴奏的吹腔”之语。此处言宜黄腔源自“秦腔”，与前面所引“来源于西秦腔”，显然是相矛盾的。从该引文“秦腔”之后，又有“西秦腔”之语，估计“秦腔”一词，应为“西秦腔”，漏了一个“西”字。因未看黄先生的原文，姑且存疑。其它三篇文章中明明都说宜黄腔来源于“西秦腔”，为何到了束先生笔下，却活生生地抠去了一个“西”字，成了宜黄腔来源于“秦腔”？即便在束先生的词典里，秦腔就是西秦腔，但也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的文章，硬说这些文章“无一不是说江西的宜黄腔（二黄腔）来源于明末的秦腔”。这显然是对原著的误读或曲解。

（三）、束先生注意到我在宜黄腔起源问题上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来源于西秦腔，一是说来源于北方乱弹。束先生的《再论》写到：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苏子裕先生在《质疑》文章中一改前面众口一词具有定论性的观点，苏文现在是这样说的：“二黄腔在江西，俗名二凡，是明末北方乱弹流入江西宜黄县产生的戏曲新腔，亦名乱弹，流传到外地时被称为宜黄腔，讹传为二黄”。

（见《戏曲研究》70辑 129-130页）苏文这里去掉了“来源于西秦

腔”增加了“讹传为二黄”，但又无任何新的举证。本来，拙文证实西秦腔（即早期的陕西秦腔）就是二黄腔，为宜黄腔源于秦腔找到本质依据，使其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然而，苏先生在此时却闭口不再提及“宜黄腔来源于西秦腔”，想来并非无意疏漏而是有意回避。（见《戏曲研究》70辑130页）

看了这段文字，使我摸不着头脑。在束先生的《京剧声腔基础源于陕西》一文中，不仅没见到有关“西秦腔”论述，甚至连“西秦腔”三字也没见到过，更何谈“证实西秦腔（即早期的陕西秦腔）就是二黄腔，为宜黄腔源于秦腔找到本质依据，使其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在宜黄腔的起源问题上，我一直在考虑，到底是提“宜黄腔发源于西秦腔”好，还是提“宜黄腔发源于北方乱弹”好？这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西秦腔也属于北方乱弹。另一方面，考虑到在宜黄腔中除有西秦腔的成分外，还有北方乱弹中其它支派的成分，似乎“宜黄腔发源于北方乱弹”的提法，更为准确一些。所以，在我的《中国戏曲声腔剧种考》论文集中，两种提法都有，而关于“宜黄腔发源于北方乱弹”的提法，要多一些，如在《两种弋阳腔：高腔与乱弹》（见论文集第31页）、《粤剧梆黄源流新探》（见论文集第103页）等文章中都可见到。我在《质疑》一文中说宜黄腔是“明末北方乱弹流入江西宜黄县产生的戏曲新腔”，是沿袭自己原来的说法，而束先生却提出“苏先生在此时却闭口不再提及‘宜黄腔来源于西秦腔’，想来并非无意疏漏而是有意回避”。请束先生有空时再翻一下我送给您的《中国戏曲声腔剧种考》一书，就足以明白，苏某既非“无意疏漏”，更不是“有意回避”。

五、关于陕西二黄戏的戏神与《秦云撷英小谱》的记载

（一）关于“老郎”与泰来班。

乾隆庚子（四十五年，1780）有“老郎端居宝座”字样的石刻碑文，没有写明老郎是谁，只有“会省骡马市四圣行宫，创自双赛、泰来班，而众班和之者也”。

束先生在《再论》中说，西安四圣行宫的创建者之一的泰来班，后来到陕南紫阳县传播二黄戏，并在杨家大院修建老郎宫：

泰来班由秦中到陕南紫阳落脚后不久，也在杨家大院修建了一座梨园庙（又叫老郎宫），往来二黄艺人均要到此祭拜，杨家皆以“流水席”招待。

梨园庙高台供奉老郎太子像，庙堂书有“三圣老郎”、“天子一家”、“梨园起教”、“前传后继”等字样。没有泰来班的存在，就没有陕南二黄戏繁荣与发展，记载和实证都是很清楚的。（页 111）

笔者对陕西二黄戏的班社情况很不了解，我想请教束先生：

1、西安的泰来班与紫阳的泰来班是否是同一个班社，或具有承传关系？

2、杨家把西安的泰来班请到陕南来，泰来班在杨家修建梨园庙，这事有何“记载和实证”？束先生在《陕西汉剧》一文(6)中说：“陕南梨园庙（也称老郎宫），在紫阳蒿坪杨家坝由杨金年所建。”（页 188）而《再论》却说是西安来的泰来班所建，未知孰是？

3、陕西二黄戏供奉的老郎是谁？束先生在《陕西汉剧》一文中说是唐玄宗，“人皆称为三郎。晚年人称老郎”。（页 188）并说紫阳县梨园庙“据袁胜录、龙玉生记忆，里边记有‘三圣老郎’、‘天子之家’、‘梨园起教’、前传后继等字样，汉剧艺人常聚于此。由此可见，艺人们敬‘三圣老郎’（唐玄宗李隆基），实因二黄源于‘梨园法曲’有关”。（188-189）可见紫阳二黄班供的老郎实为“三圣老郎”。而西安的梨园庙名为“四圣行宫”，那么，西安的“四圣”是谁？与紫阳的“三圣”有何关系？陕西二黄戏班供奉的戏神究竟是西安的“四圣”，还是紫阳的“三圣老郎”？为什么泰来班在西安参与修建的是“四圣行宫”，到紫阳来修建的老郎宫却要供奉“三圣老郎”？

《再论》说：“苏文（指笔者《质疑》一文）肯定了乾隆四十五年修建的西安梨园庙的石刻上书有“老郎端居宝座”字样，并说‘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老郎诞辰’，陕西二黄戏艺人都要去‘焚香祭祀’，但同文又提出，陕西二黄敬祀的这个老郎‘未必就是二黄戏班所供的老郎’，甚而又反复说‘不见得就是指西安二黄戏的祖师老郎’；“苏文自己把事实摆在自己面前，自己反过来又说这未必是事实，让人百思不解其意为何。”（页 125）其实这个问题，不必“百思”，烦请束先生再翻阅一下我的《质疑》一文第 73 页就一清二楚。“焚香祭祀”一事，乃是我引述《中国戏曲志·湖北卷·演出习俗》页 478 中关于湖北汉剧班社祭拜戏神的文字，引文出处写得名明明白白，并不涉

及陕西汉剧艺人。

（二）、关于一则按语的说明。

秦腔，亦称乱弹，因以梆子击节，故又有“梆子腔”之称。我所见到的清乾隆间《秦云擷英小谱》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秦人俗称秦腔为柷（姑汪切）柷子，它省则通称曰梆子”。在《质疑》一文中，我曾以这段话作为证据，说明当时的秦腔就是梆子腔。

束先生在《再论》一文中指出，“秦人俗称秦腔为柷（姑汪切）柷子，它省则通称曰梆子”这段话，并非严长明的原文，而是近人徐筱汀所加的按语。谢谢束先生的指教。尽管束先生错把徐筱汀当作其兄徐慕云，笔者还是认为束先生的考证是有道理的：这段按语，或为“筱汀”所加，不是严长明的原文。我对此未加详察，失之粗疏和无知。我所见到《小谱》的版本，出自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戏剧理论丛书《秦腔研究论著选》（1983.4）。因此书为秦腔研究者所常见，所以未注明出处，这是欠妥的。文中括号内有“汀按控音腔”五字（页173），五字连写，未加任何标点和注解，也未加任何说明。我对这五字的意思不清楚。不知是后人所加的注解，加上《小谱》中原文有多处用括号，所以把此处括号中的文字也当作严长明的原文。束先生怀疑我引文时“经过修改”，实不敢当，本人无此恶习。想必束先生不至于没见过贵省编印的这本《秦腔研究论著选》吧？只要查阅一下这个版本，就不会说我的引文是“经过修改”的。但这事在束先生看来却非常了不得：“苏文重要依据的引证错误，必然导致其结论不可能正确。所谓本错一切错”。这就有点言过其实了。笔者认为，尽管“秦人俗称秦腔为柷（姑汪切）柷子，它省则通称曰梆子。”这句话，虽不是严长明的原文，但其本身还是不错的：

一是如果这个加按语的“汀”，确实是如束文所说是徐筱汀先生的话，这可是个戏曲行家，正如束先生引文说，筱汀“旅陕多年”，“对于秦腔、皮黄俱曾下过深切之功夫”，那么，他所加的这个按语，当然是有充分根据的。不能因人废言，不能因为这句话是严长明说的就是正确的，而徐筱汀说的就是错误的。毋庸讳言，如果严长明原文如此，则更具有说服力。

二是这个按语符合秦腔的客观实际。先谈“秦人俗称秦腔为柷（姑汪切）柷子”。据黄笙闻《梆子与梆子腔考》一文，陕西各派秦腔剧种中，同州

梆子、西安乱弹、汉调弹戏、都俗称为桃桃或梆子，都用梆子伴奏。西府乱弹亦俗称为桃桃，用梆子伴奏。（页 77-79）⁽⁷⁾。严长明所记载的“秦声”也是“俗称梆子”。看来，桃桃是梆子的别名，正如《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所说“梆子腔最有特色的打击乐器枣木梆子（注：桃桃）”。据此。“秦人俗称秦腔为柷（姑汪切）柷子”这话没有错。再谈“它省则通称曰梆子”。我的《质疑》一文中，以清康熙至清乾隆年间湖北、北京、山西等地流行的“秦声”、“秦腔”都以梆子伴奏、又名梆子腔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说：“秦腔的特征，主要是用梆子伴奏，所以秦腔又名梆子腔”，这句话（即束文所谓的“结论”）何错之有？

但束先生《再论》又说，陕西二黄早期使用梆子击节，亦称“梆子腔”（见 122 页）。在《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一文中，束先生以陕西二黄中的吹腔、及唱曲牌、小调中用以击节，以及“吹腔”被艺人们俗称为“梆儿腔”等，证明陕西二黄早期是用梆子击节的。这个问题，我在《质疑》一文中已指出其有误。这里仅补充一点，在程砚秋先生的文章中，记载汉调艺人陈宗鸿告诉他：（陕西山二黄）“有的戏是唱安庆梆儿腔，例如全家福”。如果陈老艺人所说属实的话，那么束先生所谈到的陕西汉剧中的“梆儿腔”就是“安庆梆儿腔”，其来源当是徽班。可见陕西二黄戏不是“梆子腔”。

既然“秦人俗称秦腔为柷（姑汪切）柷子，它省则通称曰梆子。”这句话“本”（本身）没有错，也就谈不上我“一切错”了。

文章千古事，疑义相与析。我的回应，若有不妥，请束先生不吝赐教。

【注】

(1)见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第 64 辑 2004. 3。

(2)见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第 68 辑 2005. 9。

(3)乐钧(1766—1814)，江西临川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贡生，嘉庆六年举于乡。原诗见乐钧《青芝山馆全集》(现存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4)该《奏折》见《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本文转引自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二编《地方法令》《乾隆四十六年江西巡抚郝硕复奏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1)(第115—117页)。

(5)引自陈泽如、李平为《中国戏曲剧种大词典》“西秦戏”条写的释文，页1340。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6。

(6)该文载于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艺术研究荟录》第一辑，1982.10

(7)该文载于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艺术研究荟录》第三辑，1984.12

原载《戏曲研究》第74辑